

改革開放

簡史

本書編寫組



★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 1978年12月18日，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



★ 1997年9月12日，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



★ 2007年10月15日，胡錦濤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



★ 2012年11月15日，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同採訪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中外記者見面

目錄

第一章 改革開放拉開大幕	001
一、解放思想成為改革開放先導.....	002
二、十一屆三中全會與黨的工作中心轉移.....	008
三、撥亂反正任務的完成.....	014
四、調整經濟政策與農村改革取得突破.....	019
五、對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探索.....	023
六、推動對外開放和創辦經濟特區.....	027
七、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	034
第二章 改革開放全面展開	041
一、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與小康目標.....	042
二、推進改革開放向縱深發展.....	045
三、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法制與精神文明建設.....	058
四、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的確立.....	066
五、營造改革開放的良好環境.....	069
六、走有中國特色的精兵之路.....	076
七、改革開放經受住多種考驗.....	080

第三章 改革開放開創新局面.....091

- 一、確定經濟體制改革目標與基本框架..... 092
- 二、加快經濟體制改革步伐..... 099
- 三、為實現跨世紀發展提供重要保障..... 106
- 四、實施三大國家發展戰略..... 120
- 五、形成對外開放新態勢..... 125
- 六、積極推進中國特色軍事變革..... 137
- 七、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 142

第四章 改革開放在科學發展中深化..... 149

- 一、推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 150
- 二、實現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157
- 三、推進民主法治建設與政治體制改革..... 169
- 四、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 179
- 五、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184
- 六、履行新世紀新階段人民軍隊歷史使命..... 197
- 七、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和先進性建設..... 201

第五章 改革開放進入新時代..... 211

- 一、擘畫新時代「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 212
- 二、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佈局和戰略佈局..... 217
- 三、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 227
- 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了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 240

第六章 堅定不移推進全面深化改革	251
一、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	252
二、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建設深入發展.....	267
三、創造性繁榮社會主義文化.....	289
四、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體系.....	298
五、開創生態文明建設新局面.....	308
六、實現人民軍隊劃時代的整體性變革.....	316
七、以改革創新精神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	322
第七章 堅定不移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	335
一、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336
二、健全更高水平對外開放體系.....	344
三、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	354
四、全面推進中國特色大國外交.....	362
五、統籌發展和安全兩件大事.....	371
結束語	379

第一章

改革開放拉開大幕

風起雲天，潮湧東方。改革開放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發展史上一次偉大革命，正是這個偉大革命推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飛躍。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 100 週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立足黨的百年奮鬥歷程，從革命、建設、改革、新時代四個時期總結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創造的偉大成就和寶貴經驗，強調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前途命運的關鍵一招，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充滿新的活力的體制保證和快速發展的物質條件，中國大踏步趕上了時代。

1978 年 12 月 18 日，在中華民族歷史上，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都是載入史冊的重要日子。中國共產黨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征程。

一、解放思想成為改革開放先導

粉碎「四人幫」以後，世界密切注視着中國：中國會向何處去？這也真實反映了當時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心態。結束「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亂，中國面臨一個新的轉折關頭。當時，世界經濟快速發展，科技進步日新月異，而十年內亂導致我國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人民溫飽都成問題，國家建設百業待興。黨內外強烈要求糾正「文化大革

命」的錯誤，使黨和國家從危難中重新奮起。

鄧小平的復出，讓人們看到了希望。1977年7月17日，歷經三落三起，73歲的鄧小平重新走上領導崗位。他指出：「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國內外發展大勢，要求中國共產黨盡快就關係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大政方針作出政治決斷和戰略抉擇。

掀起思想解放大潮

歷史的巨輪往往會在慣性的驅使下，繼續沿着過去的軌道運行。「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廣大黨員幹部和人民群眾都期待着中國迅速擺脫困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但是，「兩個凡是」^①方針的提出，嚴重禁錮着人們的思想，使「左」的指導思想不能得到根本糾正。

「兩個凡是」提出不久，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就多次提出批評，倡導實事求是。1977年2月，鄧小平同前來看望他的王震談話時指出，「兩個凡是」不是馬克思主義，不是毛澤東思想。4月，鄧小平致信華國鋒、葉劍英和黨中央，針對「兩個凡是」的錯誤觀點，指出「我們必須世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的事業，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勝利地推向前進」。

1977年7月，鄧小平在黨的十屆三中全會上強調，要用準確的完

^① 「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整的毛澤東思想作指導思想，提出要把毛澤東倡導的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的作風恢復起來。9月，在紀念毛澤東逝世一週年之際，聶榮臻、徐向前、陳雲等先後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總結黨的歷史經驗，強調準確完整地宣傳毛澤東思想，闡述恢復和發揚實事求是優良傳統的重大意義。這激發起人們對「兩個凡是」造成的思想阻礙進行反思，引發到底是把實踐還是把「兩個凡是」作為判斷是非標準的爭論。

1978年5月10日，中央黨校內部刊物《理論動態》第60期刊登《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光明日報》在第二天以特約評論員名義公開發表，新華社全文轉發。之後，《人民日報》及全國絕大多數省、自治區、直轄市報紙陸續轉載。該文認為，檢驗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實踐；社會實踐不僅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而且是唯一的標準；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是馬克思主義最基本的原則；任何理論都要不斷接受檢驗，凡是科學的理論都不會害怕實踐的檢驗；馬克思主義理論寶庫並不是一堆僵死不變的教條，它要在實踐中不斷增加新的觀點和結論，拋棄那些不適合新情況的個別舊觀點、舊結論；如果躺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現成條文上，甚至拿現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無限豐富的飛速發展的革命實踐，是錯誤的。這篇文章從理論上根本否定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掀起了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

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對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予以旗幟鮮明的支持。1978年6月，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批評「兩個凡是」觀點，強調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則任何時候都不能違背，但一定要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理論和實踐相結合。他指

出，有一些同志天天講毛澤東思想，卻往往忘記、拋棄甚至反對毛澤東同志的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這樣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根本方法；他們的觀點，實質上是主張只要照抄馬克思、列寧、毛澤東同志的原話，照抄照轉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說這是違反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違反了中央精神。這一講話被作為中央文件下發並在《人民日報》上全文發表，對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和實際工作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

1978年6月24日，《解放軍報》發表特約評論員文章《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從理論上系統地回答了對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提出的責難，認為怎樣對待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不是一個小問題，而是一個真捍衛還是假捍衛毛澤東思想的問題。中央及省級報刊共刊登討論文章650多篇，一場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迅速在全黨全社會展開。

1978年9月，鄧小平視察本溪、大慶、哈爾濱、長春、瀋陽、鞍山、唐山、天津等地，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談話，後被稱為「北方談話」。這個談話的要點包括：「兩個凡是」不是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是實事求是；實事求是、理論與實際相結合、一切從實際出發，這是政治問題，是思想問題，也是我們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現實問題，不恢復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四個現代化沒有希望；要根據現在的國際國內條件，敢於思考問題，提出問題，解決問題，千萬不要搞「禁區」；要解放思想，開動機器，不合理的東西可以大膽改革；關起門來不行，要好好向世界先進經驗學習；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根本表現，就是能夠允許社會生產力以舊社會所沒

有的速度迅速發展，使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能夠逐步得到滿足，必須發展生產力，改善人民生活條件等。這一談話對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根本任務、發展動力等根本問題進行了不同程度的闡述，集中反映了鄧小平在歷史大轉折時期的理論思考。

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形成了思想解放的大潮，打破了教條式的理論禁錮，推動恢復了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在社會主義中國，這場思想解放運動，蕩滌僵化落後的觀念，衝破思想的禁區，打破發展的僵局，為作出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實現偉大的歷史轉折作了必要的思想和理論準備。

恢復高考制度

1977年冬天，關閉11年之久的高考考場大門重新打開。1977年冬和1978年夏，高考參試總人數達1160萬人。高考制度的恢復，不僅成為許多人命運的轉折點，而且成為一個國家與時代發展的拐點。

「文化大革命」中文化教育領域首先遭到衝擊，「兩個估計」^①成為教育工作者及廣大知識分子的沉重精神枷鎖，並成為文化教育領域的桎梏。鄧小平敏銳地認識到中國要走現代化建設之路，必須重視教育和科技。恢復高考制度成為鄧小平復出後打破「文化大革命」思想枷鎖的重要突破口。

① 1971年8月13日，中共中央轉發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提出了「兩個估計」：新中國成立後17年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基本上沒有得到貫徹執行，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大多數教師和新中國成立以後培養出的高等學校學生的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

1977年8月，鄧小平主持召開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果斷決定：改變「文化大革命」時期推薦上大學的高校招生辦法，於當年恢復中斷了長達11年的高校招生考試制度。他一錘定音地說，「今年就要下決心恢復從高中畢業生中直接招考學生」。9月，鄧小平親自修改教育部報送的《關於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中的政審標準和工作要求，強調主要抓兩條：第一是本人表現好，第二是擇優錄取。10月，這一意見獲國務院批准、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報》頭條刊發《高等學校招生進行重大改革》報道，正式公佈了恢復高考這一重大消息，全國上下歡呼雀躍，奔走相告。這一年，570多萬名考生從農村、城市、部隊走進考場，27.3萬人被高等學校錄取。高考制度的恢復，激起了廣大青年學習科學文化知識的熱情，為國家選拔了大量優秀人才，被譽為向四個現代化進軍的盛舉。

1977年11月18日，《人民日報》發表經中央政治局審定的教育部大批判組文章《教育戰線的一場大論戰——批判「四人幫」炮製的「兩個估計」》，推倒了多年來壓在教育界和知識界頭上的「兩個估計」，對肅清「文化大革命」在其他領域的影響起到了標杆性帶動作用。

迎來「科學的春天」

我國著名數學家陳景潤對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作出了重大貢獻，為摘取數學王冠上耀眼的明珠，付出了全部的青春和才華。1978年，發表於《人民文學》第1期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使陳景潤這個名字家喻戶曉，激勵人們走向科學和知識的春天。

1978年3月，全國科學大會在北京召開。鄧小平在會上指出，四個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沒有現代科學技術，就不可能建設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沒有科學技術的高速度發展，也就不可能有國民經濟的高速度發展。正確認識科學技術是生產力，正確認識為社會主義服務的腦力勞動者是勞動人民的一部分，這對於迅速發展我們的科學事業有極其密切的關係。

鄧小平的講話澄清了長期束縛科學技術發展的重大理論是非問題，掀開了科學技術事業發展的新篇章，成為按下科學春天的觸發器。全國科學大會審議通過《1978—1985年全國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草案）》，將108個項目確定為全國重點科研項目，有力地推動了科技領域的撥亂反正，廣大科技工作者揚眉吐氣。科學技術事業發展受到全社會高度關注，對隨之而來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產生了深遠影響。

在大會閉幕式上，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音員朗誦了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的書面講話《科學的春天》，向全國人民傳達了對這次大會的詩意表述：「這是革命的春天，這是人民的春天，這是科學的春天！讓我們張開雙臂，熱烈地擁抱這個春天吧！」

二、十一屆三中全會與黨的工作中心轉移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猶如春雷喚醒神州大地，標誌着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偉大覺醒。全會結束了粉碎「四人幫」後黨和國家工作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

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實際上形成了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在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的領導下，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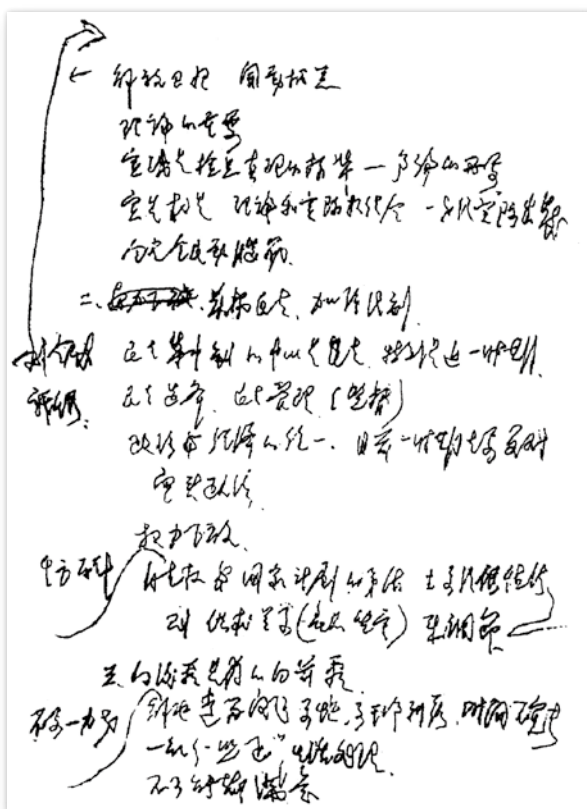
具有深遠意義的中央工作會議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黨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會議原計劃討論經濟方面的問題，沒有涉及真理標準討論等大是大非問題以及黨內外普遍關注的冤假錯案平反問題。陳雲等老一輩革命家明確提出，首先要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為「天安門事件」和一些重大冤假錯案進行平反；要在真理標準問題上進行討論，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這些呼聲得到了與會者的積極響應，由此改變了會議原定的議程和內容。

這次會議取得了許多重要成果：一致同意從1979年1月起，把全黨工作的着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決定為「天安門事件」和歷史遺留的一批重大冤假錯案平反，重新評價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充分肯定了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重大意義；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於人事問題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人選的建議。會議還對推進體制機制改革，實行對外開放的必要性、緊迫性和方法途徑等進行了深入討論。

12月13日，在會議閉幕式上^①，鄧小平發表《解放思想，實事求

^① 閉幕會後，由於要學習和討論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在閉幕會上的講話，會議又接着開了兩天。各組對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三位中央領導人的講話一致表示擁護，對這次會議的民主氣氛和解決了一系列重大問題表示充分的肯定，並對之後的工作提出了許多很好的意見和建議。12月15日，歷時36天的中央工作會議圓滿結束。



鄧小平親擬的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提綱（部分）

是，團結一致向前看》講話。他指出，解放思想是當前的一個重大政治問題，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幹部和群眾的思想，四個現代化就沒有希望；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他充分肯定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的意義，指出這是個思想路線問題，是個政治問題，是個關係到黨和國家前途和命運的問題。

鄧小平指出，這次會議解決了一些過去遺留下來的問題，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安定團結的需要，目的正是為了向前看，正是為了順利實現全黨工作重心的轉變。他特別指出，要完整地、準確地理解和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原理，並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加以發展。他強調，要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如果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

鄧小平指出，在經濟政策上，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於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就必然產生示範力量，就會使整個國民經濟不斷地波浪式地向前發展，使全國各族人民都能較快地富裕起來。

鄧小平的講話，把準了社會變革的脈搏，回應了時代的呼聲，在隆冬時節給人們帶來了春天的期盼。這篇講話，實際上是隨後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成為「開闢新時期新道路、開創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理論的宣言書」。

實現歷史性的偉大轉折

瑞雪兆豐年，飛雪迎春到。1978年12月18日，在北京罕見的大雪天裡，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隆重召開，給嚴冬帶來了春天的訊息，奏響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春之序曲。

全會衝破長期「左」的錯誤的嚴重束縛，徹底否定「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高度評價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重新確立了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全會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及時

地、果斷地結束全國範圍的揭批林彪、「四人幫」的群眾運動，決定從 1979 年 1 月起，把全黨的工作着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

為適應全黨工作着重點轉移的要求，全會強調，實現四個現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產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場廣泛、深刻的革命，必須根據新的歷史條件和實踐經驗，採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經濟措施，對經濟管理體制和經營管理方法着手認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積極發展同世界各國平等互利的經濟合作，努力採用世界先進技術和先進設備，並大力加強實現現代化所必需的科學和教育工作。

針對我國經濟管理體制中存在的權力過於集中的問題，全會提出應該有領導地大膽下放權力，讓地方和工農業企業在國家統一計劃的指導下有更多的經營管理自主權，以發揮中央部門、地方、企業和勞動者個人四個方面的主動性、積極性、創造性；堅決按經濟規律辦事，重視價值規律的作用，擴大廠礦企業和生產隊的自主權；着手大力精簡各級經濟行政機構。全會要求，必須集中主要精力把農業盡快搞上去，並提出了發展農業生產的系列政策措施和經濟措施：切實保護人民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的所有權和自主權；認真執行按勞分配原則，按照勞動的數量和質量計算報酬，克服平均主義；任何人不得亂加干涉社員自留地、家庭副業和集市貿易；較大幅度提高糧食等主要農產品收購價格，降低農用工業品價格；積極發展農村社隊工副業。

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必須遵循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全會明確，黨中央在理論戰線上的崇高任務，就是領導、教育全黨和全國人民歷史地、科學地認識毛澤東同志的偉大功績，完整地、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並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加以發展。全會認真討論了「文化大革命」中發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和「文化大革命」前遺留下來的某些歷史問題，決定撤銷 1976 年發出的有關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和「天安門事件」的錯誤文件；審查和糾正了過去對彭德懷、陶鑄、楊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錯誤結論，指出這是完整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體系的表現。

全會強調，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具有穩定性、連續性和極大的權威性，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要保證人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超於法律之上的特權。全會總結和吸取黨的歷史經驗教訓，決定健全黨的民主集中制，健全黨規黨法，嚴肅黨紀，指出對於違犯黨紀的，不管是甚麼人，都要執行紀律，做到功過分明、賞罰分明、伸張正氣、打擊邪氣。

全會增選了中央領導機構成員，從組織上加強了中央領導機構，保證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執行。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偉大序幕。自那時起，改革成為時代強音，開放成為時代潮流，中國人用勤勞與智慧完成了一場場激動人心的精彩敘事，有着古老文明的中華大地開始呈現一派盎然生機。

三、撥亂反正任務的完成

為了把工作中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黨和國家有步驟地完成撥亂反正任務，解決新中國成立以來許多歷史遺留問題和實際中出現的新問題，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得以形成。

平反冤假錯案和調整社會各方面關係

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是黨和人民的事業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的重要保證。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大批黨員幹部遭到林彪和「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的殘酷迫害。平反冤假錯案，積極調整社會各方面的關係，成為當時黨內國內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

中央和地方遵循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徹底平反糾正冤假錯案。1978年12月24日，黨中央為彭德懷、陶鑄舉行了追悼大會。這是落實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要求，最早平反的涉及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冤假錯案。1979年2月，黨中央決定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央組織部組成「劉少奇案件復查組」，對該案進行全面復查。經過周密的調查研究，反覆核對材料，「劉少奇案件復查組」於11月向黨中央遞交《關於劉少奇同志案件的復查情況報告》。1980年2月，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為劉少奇平反昭雪，恢復了他作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無產階級革命家、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之一的名譽，高度評價他的光輝一生。5月17日，劉少奇追悼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鄧小平代表黨中央致悼詞。到1982年底，全國大規模

平反冤假錯案工作基本結束，一批有經驗、有能力的黨員幹部重新走上工作崗位。

在對冤假錯案進行復查平反的同時，黨中央對發生在「文化大革命」前由於歷次政治運動中「左」的錯誤和其他方面的錯誤而產生的大量案件和歷史遺留問題，進行了復查清理，多方面調整社會關係。從 1979 年 1 月起，黨中央決定開始摘掉地主、富農分子的政治帽子，給予他們人民公社社員待遇；為國民黨起義、投誠人員落實政策，寬大釋放了在押的原國民黨縣團以下的黨、政、軍、特人員；按照黨中央統一部署，各地區各部門對反右派鬥爭嚴重擴大化中劃定的「右派分子」進行了甄別改正。從 1979 年 11 月起，開始把小商、小販、小手工業者及其他勞動者從原工商業者中區別出來。到 1981 年，70 萬人恢復了勞動者身份。

1978 年至 1979 年，各民主黨派、全國工商聯和各人民團體分別召開代表大會，選舉各自的領導機構和領導人，標誌着各民主黨派、全國工商聯和各人民團體開始恢復和發展；1980 年，中國伊斯蘭教協會、中國道教協會、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中國佛教協會先後召開會議，恢復了正常工作；落實台胞、台屬政策和僑務政策。這些政策對促進社會安定團結，鞏固和發展愛國統一戰線，理順人心，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推動現代化建設事業起到了重要作用。

到 1982 年底，平反冤假錯案、有步驟地妥善處理歷史遺留問題、調整各方面社會關係工作基本完成。「家庭出身」「海外關係」等長期困擾人們的身份概念，在撥亂反正中冰融雪解。團結一致向

前看，全身心投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生動局面基本形成。

對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案主犯的審判，是民主法制建設中引人注目的大事。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通過了《關於成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檢察、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的決定》。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開庭公審這兩個反革命集團案10名主犯，彰顯了社會主義民主法制的莊嚴。

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在中國這樣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沒有任何先例可循，猶如攀登一座人跡未至的高山，一切攀登者都要披荊斬棘、開通道路。

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社會主義建設的全面展開，為實現中華民族獨立和振興、中國人民解放和幸福，作出了彪炳史冊的貢獻，為黨和人民事業勝利發展、為中華民族闊步趕上時代發展潮流，創造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和實踐基礎。不能否認，毛澤東在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中走過彎路，晚年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犯的錯誤，在於違反了他自己正確的東西，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家、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所犯的錯誤，既有主觀因素和個人責任，也有國內國際的複雜社會歷史原因。如何全面、歷史、辯證地看待毛澤東，已經不是對他個人的功過評價問題，而是一個關係黨和國

家前途命運的重大政治問題。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隨着撥亂反正的進一步展開，黨內外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經驗教訓進行總結的呼聲高漲，要求正確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地位、科學把握毛澤東思想。1979年9月，黨的十一屆四中全會通過葉劍英代表黨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0週年大會上的講話，對新中國成立以來30年的歷史經驗進行了初步總結。

1979年11月，黨中央決定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0年3月19日，鄧小平就起草《決議》提出3條明確要求：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對新中國成立30年來歷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錯誤的，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負責同志的功過是非，要作出公正的評價；通過這個《決議》對過去的事情做個基本的總結，總結過去是為了引導大家團結一致向前看。4月1日，鄧小平具體談了對新中國成立以後毛澤東的評價問題。他強調，講錯誤，不應該只講毛澤東同志，中央許多負責同志都有錯誤。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的人都正確，只有一個人犯錯誤。這不符合事實。

《決議》討論稿完成後，從1980年9月起在黨內一定範圍內徵求意見。其中，影響最大的是10月中旬到11月下旬黨內4000名高級幹部的討論。在討論過程中，焦點問題之一是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問題。鄧小平旗幟鮮明地表態，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此前，他就曾指出，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這絲毫不是甚麼誇張。毛澤東思

正確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堅決維護了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強調要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統一思想，團結一致向前看。

《決議》深刻總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教訓，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逐步確立的、適合我國情況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正確道路的主要點，作了 10 個方面的概括和總結^①，初步提出了在中國建設甚麼樣的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科學指明了新起點上中國社會主義繼續發展的前進方向。

《決議》標誌着黨在指導思想上撥亂反正任務的勝利完成，對於統一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思想認識，同心同德為實現新的歷史任務而奮鬥，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歷史作用。

四、調整經濟政策與農村改革取得突破

在粉碎「四人幫」後的最初兩年裡，黨的工作和國家經濟形勢有了明顯好轉，但農業與工業、輕工業與重工業、積累與消費等重大關係比例失調問題依然突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體制保證了高積累下的

① 10 個方面的概括和總結，即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我國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必須從我國國情出發，量力而行，積極奮鬥，有步驟分階段地實現現代化的目標；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變革和完善必須適應生產力的狀況，有利於生產的發展；在剝削階級作為階級消滅以後，階級鬥爭已經不是主要矛盾；逐步建設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根本任務之一；社會主義必須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改善和發展社會主義的民族關係，加強民族團結，對於我們這個多民族國家具有重大意義；必須加強現代化的國防建設，國防建設要同國家的經濟建設相適應；在對外關係上，必須繼續堅持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維護世界和平；必須把我們的黨建設成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黨。

社會穩定，但同時存在着經營管理過於集中、農村經濟效率不高等問題。這些問題加上我國經濟體制中長期存在的其他弊端，極不利於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

調整國民經濟

1978年，我國工業生產比1977年有較快增長。但是煤炭、電力等仍然不能滿足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全國重點企業主要工業產品質量指標有43%沒有恢復到歷史最好水平；燃料、動力和原料、材料消耗指標，有55%沒有恢復到歷史最好水平；全國工業系統的全民所有制企業中，還有24%的企業存在不同程度的虧損；一部分工業產品品種、規格不對路，質量不合格，形成積壓。國民經濟調整和整頓的任務很繁重。

1979年3月14日，李先念、陳雲就財經工作聯名致信黨中央，提出前進的步子要穩，不要再折騰，必須避免反覆和出現大的「馬鞍形」；現在的國民經濟是沒有綜合平衡的，比例失調的情況是相當嚴重的。3月21日至23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1979年國民經濟計劃和國民經濟調整問題。鄧小平在會上指出，現在的中心任務是三年調整，這是個大方針、大政策；首先要有決心，東照顧西照顧不行；過去提以糧為綱、以鋼為綱，現在到該總結的時候了。會議通過修改後的1979年國民經濟計劃，對有關指標進行了大幅度下調。

1979年4月，中央工作會議正式提出「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決定從1979年起，用3年時間堅決地、逐步地把各方面嚴重失調的比例關係調整過來，使整個國民經濟真正納入有計劃、

按比例健康發展的軌道。但由於長期積累的「左」的思想和急於求成的心態，許多部門和地方對經濟形勢的嚴重性、經濟調整的必要性緊迫性的認識不足。為此，黨中央於 1980 年 12 月又召開工作會議，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經濟建設經驗教訓進行總結，下決心去掉不切實際的設想，去掉主觀主義的高指標，使全黨對經濟調整的緊迫性必要性、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長期性艱巨性，都有了更加清醒的認識。會議決定，從 1981 年起對國民經濟進一步調整，以實現經濟工作的穩定和主動。

五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通過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我國今後經濟發展要真正從實際情況出發，走出一條速度比較實在、經濟效益比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實惠的新路子，並提出了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中心發展國民經濟的具體措施。

到 1982 年底，國民經濟扭轉了重大比例失調造成的不穩定狀態，逐步走上了健康發展的軌道，長期存在的積累率過高和農業、輕工業嚴重落後的狀況有了明顯變化。

探索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由於多年來農村工作中「左」的政策影響，「文化大革命」結束時，全國還有 2.5 億人沒有解決溫飽問題。面對嚴峻的農村經濟形勢，許多地方大膽進行了農村改革探索。1977 年 11 月，安徽省委通過《關於當前農村經濟政策幾個問題的規定》，提出允許生產隊根據農活建立不同的生產責任制、尊重生產隊的自主權、減輕社隊和社員的負擔、允許和鼓勵社員經營自留地和家庭副業、開放集市貿易等。

這是粉碎「四人幫」後，首份允許生產隊建立生產責任制的文件。

1978年，安徽遭遇嚴重旱災，為趕上秋季小麥播種，一些生產隊突破規定，以借地種麥、借地度荒的名義將土地包給農民分組耕種，甚至分戶耕種。9月，安徽省委召開緊急會議，大膽作出了支持「借地度荒」的決定。在「借」字的啟發下，一些地方和農民自發實行包乾到組或包產到戶責任制。1978年的一個冬夜，安徽省鳳陽縣小崗生產隊的18戶村民簽下了「大包乾生死狀」：把應該交給國家、留給集體的糧食固定下來，收穫以後收多收少都是農民自己的。同時，廣東、貴州、雲南等地許多生產隊也採取了類似做法，並得到了當地黨和政府的支持。這種「包乾到戶」簡單易行，推行後深受當地農民歡迎。隨後，在農業生產責任制基礎上形成的以家庭聯產承包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逐漸成為黨和國家農村政策的重要基石。

1979年2月19日，《人民日報》發表《靠辛勤勞動過上富裕生活》，報道了廣東省中山縣小欖公社埗西二大隊第二生產隊社員黃新文的事跡。黃新文一家靠參加生產隊集體勞動和發展以養豬為主的家庭副業，1978年全年總收入為10700多元，大大超過當地收入水平。文章說，黃新文對國家、集體的貢獻大，個人收入多，根本不是甚麼「資本主義」，他走的路子沒有錯，應該受到讚揚和鼓勵。這成為第一個被公開報道的農民「萬元戶」。「萬元戶」叫法隨後在全國範圍內流行起來，成為人們追求生活富裕最直接、最明顯的標誌，激發了人們勤勞致富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黨的十一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指出政策是否符合發展生產力需要，要看這種政策能

否調動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允許社、隊在國家統一計劃的指導下因時因地制宜，保障自主權，發揮主動性。這一決定為農村體制改革打開了政策大門。

各地興起的包產到戶、包乾到戶，激活了沉睡多年的鄉村，但也引起社會上一些人的疑慮，擔心會偏離社會主義道路。1980年5月，鄧小平有針對性地指出：「農村政策放寬以後，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有的同志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9月，黨中央印發《關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肯定包產到戶是依存於社會主義經濟，而不會脫離社會主義軌道的，沒有甚麼復辟資本主義的危險。

在黨中央大力支持下，各種形式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迅猛發展，到1982年達到了全國生產隊總數的86.7%，比1980年增加36.7個百分點。1982年1月，黨中央批轉《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明確指出目前實行的各種責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額計酬，專業承包聯產計酬，聯產到勞，包產到戶、到組，包乾到戶、到組等，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生產責任制。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使農民獲得生產和分配自主權，解決了生產管理過分集中、經營方式過分單一等問題，受到農民普遍歡迎。

五、對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探索

農村改革的率先突破，為其他領域的改革作出了示範、積累了經